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By William T. Row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xiii + 437. \$60.00.

本書作者 William T. Rowe 對湖北省可說情有獨鍾；二十多年前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他對該省大城市漢口的近代歷史詳加探究，撰成巨著兩冊，分別於1984及1989年問世。近年學界因「文化研究」蔚為風氣，史家精力咸聚焦於都市史，特別是二十世紀初大都會的文化史；在這氛圍下，農村史研究幾近一蹶不振。作者因而感到有必要將研究轉向農村地方史，遂選定既具強烈的鄉土榮譽感，歷史上也素以泯滅人性的暴力而全國知名的湖北麻城縣為其探討對象。

顧名思義，本書的中心即為湖北麻城縣七個世紀的暴力歷史。書中所要探究的是：何以中國某些地區，即便經長時間的歷練，超越甚為重要的文化、經濟、社會及政治的變遷，仍動輒以暴力相向？何以這些地方藉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竟成為一種慣性選擇？換言之，就是中國農村社會暴力的病理。作者在導言中表示，冀望以一個小地方的長期經歷（從十四世紀後半葉蒙元被逐，至1938年日本入侵中國的七個世紀）的個案研究基礎上，有助於對中國農村社會中的暴力現象作較為深入的探討。在這一過程中，地緣政治的戰略軍事中心地位及根深蒂固的社會緊張而外，他認為集體記憶、歷史意識和其他常規化的文化習俗（如民間宗教、民俗等）也起了重大作用。暴力文化在麻城實與集體記憶及地方史實踐的運作分不開。當地的地方史著作所尋求的是古為今用，但並非沒有備受爭議或抵制。地方史中長期充斥的是受人歡呼喝采的英雄及被喝倒采的惡棍，但史誌中，無論英雄或惡棍（如李贄）的認定都必須經地方菁英的充份協商；社會失憶症或選擇性記憶在重建過去中也起作用，如：頌揚明末的鄉賢梅國楨受民愛戴，卻對他在縣中擁有最多奴僕視若無睹。就書中內容所見，作者傾向於接受中國文化內，「認可的暴力」同樣在菁英或民眾中都存有寬敞空間這一看法。他指出麻城歷史中，二種特定暴力的文化模式似特別顯著，但決不是這一地區所獨有：其一即為眾所周知的英雄或俠客的，以及其流傳更廣、更易達到的變體——好漢——的理想典範。另一模式則更為基本且無所不在，使暴力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此即荷蘭中國研究學者 Barend J. ter Haar 所稱的「惡魔範例」。神通廣大的惡煞威脅既無所不在，勢需有可相比較的堅強回應，這便為暴力在中國大眾（包括文人）文化提供正當合法的基礎。就麻城的歷史所示，相當程度上，足為「惡魔範例」的生動例證。

本書是一長時段的地方史。全書將麻城歷史作為兩個長週期，分別以1626–1650及1926–1950年間兩次大規模清剿達到頂點。職是之故，全書亦分為兩部份，就七個世紀中五次大動亂（十四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十七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詳加探討，而各以這前述兩次前所未有慘絕人寰的剿滅作為結束。事實上，全書所要強調的正是當地的暴力節奏；周期性發生的大屠殺事件，疊加於已成慣例，日復一日偶而間斷的殺戮、傷殘及強制上。麻城在歷史上只是個不大具有全國性意義的小地方，當地居民對此甚為了解。作者

相信這種地方意識成為麻城人一貫表現的具侵略性的鄉土榮譽感、對地方自主的強烈迫切要求及不時出現於當地與中央集權化勢力的流血衝突的基礎，而中央與地方的緊張時刻隱伏待發。他強調，就族群而言，麻城的人口頗具同一性，毫無證據顯示族群仇恨宿怨在世代的地方社會衝突中起到作用；明末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兩次大屠殺，雖因諸如外族的征服及外來的意識型態等其他因素而更為複雜，但基本上實由當地富人和窮人之間鬱積的仇恨所致。麻城的不平等階級關係一向處於緊張危險的狀態。從明至民國數百年來，抗稅運動在當地是最為熟悉的集體抗議方式，部份是源於中央與地方，以及國家與社會的持續緊張情況。集體暴力本質上是反應性的，是當地人面對威脅時，用以捍衛習以為常的生活及作事方式。有時這些騷動會升級為規模及於地方，甚或及於政權輪替的叛亂。當地有產菁英當中，懼怕變亂的意識特別強烈。

就麻城來說，實以中部及西南部為核心，農業商業化、財富累積、土地所有集中及社會分層在肥沃的山谷頗為明顯。此區人口密度高，為縣城、大部份行政中心及批發商業所在，大城鎮、大地主及士大夫都聚集於此。北部大別山區雖為中國最早開發定居的地區之一，但人口密度低於縣內其他各區；兵、匪之禍則首當其衝，生計以務農為主；可耕地極為有限，僅資糊口而已。因擁有土地幾近無利可圖，故此區地主所有制的規模遠小於南部並不出人意外；現存地主因地位向下流動的噩夢無時不在，遂更具不尋常的攘奪性。東部及東南部的山區因一系列山巒的插入而與麻城各區分隔；麻城、羅田、黃岡三縣的接界處就是東山高地的中心。同屬麻城邊緣，東山與北部大別山區卻完全是另類。東山行政上雖與麻城縣連在一起，但從來就不是低地核心區的從屬，個人特性及社群團結也遠較其他各區鮮明，並以暴力表達這自主訴求為特點。

各區之間的競逐及相互蔑視，又與縣內另一存於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持續緊張相互動；鄉村與縣內核心區主要城鎮中心的宿怨在縣城至為明顯，在不同程度上也普遍存在於較小的城市如宋埠、中館驛、岐亭及白果等。麻城地方當局在變亂時應變的原則為：著眼於防守築有外牆的城市，棄農村於不顧，並在撤往城鎮前，自動積極地對鄉村採取堅壁清野的措施。這在歷史中屢獲充份證明。從蒙元到民國，當局利用核心城鎮及西南部作為清剿邊緣區的桀驁不馴份子的基地已成慣例。凡此都讓城市成為農村攻擊的首要目標，並在麻城歷史中一再重演。麻城農村與城市或者核心與邊緣的複雜關係還不止此。當地人文生態最顯著的特徵為：中華帝國晚期，山坡有高牆防衛，財富及食品供應無缺的堡寨，在動蕩不安之際，其存在及迅速發展為縣人提供變通可行的避難場所。這些加固設防的農村堡寨，有時甚或會改變官員及文人菁英在社會動蕩不安時盤踞於市中心的常規作法；當城鎮被圍困時，這些要人棄城鎮而就堡寨。

匪患持續威脅是當地社會趨向長期尚武的軍事化過程的最基本因素；武術成為地方的特定傳統。匪患威脅而外，尚有其他普遍存在的暴力。至遲在十六世紀東山及大別山高地的獵戶日常已有歐洲款式的火槍裝備。重武器（包括火炮）則在明末引進，成為地方生活所接受的常用品。武術，特別是拳術，在當地社會結構中，較諸槍炮更為根深蒂固，武館無所不在，全縣以尚武知名。在動亂的年代，地方民眾更是全心投入練武。

以上為全書架構的梗概；作者從此切入，逐章就專題展開深入討論。他自言本書是小歷史或微觀歷史，並「認同微觀史家重新找回普通人的感覺及生活經歷的目標」，即嘗試理解這些人如何「解釋他們時代的變遷」。同時強調本書是長時段的地方史，「長期觀點讓我們探索生產系統的持續及變遷、微區的特性、都市與農村的關係、地方社群的團結性及對外來控制的抗拒、霸權及貶抑的體制、性別的角色及關係、脅迫的機制、集體行動的動員方式、地方暴力文化的語境等」。通觀全書後，就作者所揭櫫的目標看來，管見認為本書作為長時段地方史，遠較小歷史成功；換言之，作者在「重新找回普通人的感覺及生活經歷」方面的業績，與他原先期望的，或有相當落差。其中癥結所在，相當程度上實因史料性質局限，與作者能力無關。本書取材豐富，引用的基本史料包括地方志、文集、官文書、調查報告、檔案等。文集和官文書多出自士大夫菁英之手，下層民眾的實際生活本不是他們記錄重點。冀望藉這批人的詮釋記錄從事小歷史探索，雖不能說緣木求魚，但不免隔靴搔癢。

相對於作者先前兩本有關漢口的著作著重問題析論，本書則明顯較偏重歷史敘述；導言中他也直言不諱，表示本書「按年代順序編排，表現則文學多於科學，描述多於分析，聚焦於細節及特點，關心錯綜複雜的人類經驗」。作者文筆雋永，表達力強，用句遣詞尤見心思。他善於構思章節安排，每章均以人或事為主軸，逐層深入細緻探討，構成充實動人的個案研究。各章之間復環環相扣，綜觀則為一本引人入勝、驚心動魄的社會史論著。第一章除介紹麻城暴力的社會人文生態背景外，又以袁枚筆下十八世紀當地兩個姻親家族之間的宿怨，其中一方的妻子私逃回娘家，被關於屋中的假隔牆逾年所引起的一波三折的一篇寫實記載作為插曲。參照第十一章中「性別戰爭」一節，上世紀二十年代國民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因左傾幼稚病的過激行動，引起地方軍人夏斗寅強烈報復。夏對婦女尤為厭惡，極盡凌虐羞辱之能事（按：同樣的政治迫害，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共鄂、豫、皖肅反）。這兩章相關部份合而觀之，生動勾勒出麻城婦女長期受壓制，其地位幾淪為奴隸的慘狀。梅氏為當地最早安居的強宗大族，耿氏則為向梅氏地方霸權挑戰的後起新貴；十六世紀後半當地政治主要爭論點中，梅國楨和耿定向分別站於敵對的一方。梅、耿之間先是因黃安從麻城析出建縣的利益衝突而交惡。十六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耿定向是縣令穆煒賦稅改革的堅定支持者；他又與穆煒的地方心腹黃卷（1529年進士）為密友。作為地方第一號大地主的梅氏，經濟上自會因賦稅改革而不滿，故對穆煒的倡議甚為抵制。放浪形骸的名士李贄長期居停於麻城，其個人英雄主義理想與梅氣味相投而結合，卻加深地方菁英社會內部分歧。第四章中，藉著梅、耿兩家爭論，作者具體而微地把明末麻城人際及宗族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娓娓細述。其他如第五、六章梅之渙還鄉記及東山之亂，第十二章張國燾鄂、豫、皖肅反擴大化，亦同樣扣人心弦。然因篇幅所限，無法細表。

作者不徒以美文敘述為能事；他表示「合適作微觀分析時絕不躲避」。事實上，書中不少重要發現即來自透闢的剖析。如對於七個世紀以來麻城的盛衰消長及內部權力結構的轉移，作者有以下敏銳的觀察：麻城經歷了兩個時期的繁榮。其一為明中葉到明末，

農業商業化為其中關鍵；商業及出口農業的利潤，投資於發展教育的基本設施（如家塾、族塾、村塾及書院等），其結果可從下面數字得見一斑。有明一代麻城產生一百一十名進士及四百二十一名舉人，勝過華中其他地方。必須指出的是：麻城因科考成功而知名全國的情況，出現於十五世紀後半葉（明代最初的一百二十年間，麻城只考中十七名進士）。另一個全盛期為清中葉至晚清，富有創業精神的黃幫商人，把基地設於商業興旺的麻城及其附近各縣，既支配華中欣欣向榮的貿易，對麻城內部經濟也有明顯向後連動的影響——十八世紀末註冊市鎮總數迅速發展。悠久的商業宗族如宋埠施氏及中館驛林氏等都發了大財，權力也達到頂點。經濟繁榮並不相應反映於文教及政治顯赫地位的維持；不論用甚麼標準衡量，麻城都退於邊緣位置（只有進士四十六名、舉人二百零六名）。這兩時期麻城內部權力結構大不相同。前一時期是由中部及西南部核心區長期藉著農業商業化、土地開墾添加（購買、投獻）累積財富，藉著科考仕宦向上流動，具高學養，並相互通婚的宗族縉紳支配。後一時期的地方權力，自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以降，從核心區文人地主轉移到東山高地那些財富、學識較低下的地方強人劉君孚、余雅祥、鄭漸達、夏斗寅等。他們的主要資產單純不過，就是控制武力。其他洞見如：當地武裝地方菁英在武斷鄉曲的過程中，至少盜用了部份中央特權，發生於十七世紀七十年代清政府權力鞏固時，要比別處早而徹底。舉一反三，其他精到處，恕不多贅。

一本篇幅四百多頁，涵蓋七個世紀的長時段著作，錯誤及可資商榷之處難免。謹就其犖犖大者提出就教於作者：頁 49、59、67 謂朱元璋原籍江西，按：朱為當日淮西江北道安豐路濠州人，隸河南江西行中書省，唯元代江西行省範圍遠大於今江西，為免誤會，應作濠州（今安徽鳳陽）人較妥。頁 83–84 謂袁宗道、宏道、中道三位明代文學家為湖南人，按三人籍貫公安，當日隸屬湖廣承宣布政司荊州府，在今湖北省內。頁 101–2 謂李贄在其《史綱評要》中，重覆援引「好漢」一詞，按王利器、王重民等專家已經考證出《史綱評要》是託名李贄所撰的偽書。頁 116 載馮夢龍編纂，題為《麟經指月》的著作，作者將指月譯為 A Monthly Guide，而不識其為佛教用語，「『指』喻言教，『月』譬佛法，……文字語言（指）是教人認識佛法（月）的一種途徑」，¹ 故或譯作 A Guide to the Principle of ... 更佳。頁 144 載崇禎皇帝自殺後，福王稱號為洪武（Hongwu）皇帝，此實張冠李戴，弘光誤認作洪武。頁 148 謂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永曆皇帝經廣西、湖南、雲南，最後至緬甸，1662 年在當地安詳逝世。此與史實顯有出入。永曆於 1659 年入緬，1661 年被緬人獻給吳三桂，翌年在昆明被縊殺。至於其他音譯或體例的一些問題，無法逐一細列。

¹ 劉保金：《佛經解說辭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74。

有關中國暴力史的研究方興未艾，本書雖不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卻可能是首本以長時段，就某一地方作深入探究的微觀論著。全書讀來觸目驚心，但又趣味盎然，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By Man-houng Li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xxvi + 362. \$49.95/£32.95.

This important work by Man-houng Lin, who is a Senior Researcher in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s Academia Sinica and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s likely to appeal to a variety of scholarly audiences. Following an "Explanatory Note" in which the author presents a clear and concise descrip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monetary system,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her book, which she calls "Part One—Global Links: Silver and the World," contain material that will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those concerned with China's place i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Chapter One ("A Vulnerable Empire"), Lin examines the role played by foreign silver in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approximately 1500 to 1850. Among the key points she makes here are the following: (1) because China's domestic supplies of precious metals were inadequate to meet the country's monetary needs, the economies of both the Ming (1368–1643) and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were dependent on silver imports to sustain monetary growth and promote economic stability; (2) because of the high degree of interregional and of rural-urban economic integration that characterized pre-modern China in general and the late Qing period in particular, b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untry's use of silver for monetary purposes was much more widespread geographically than is commonly believed; and (3) and because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had no control over the amount of bullion being mined abroad and thus over the quantities of silver that would eventually enter the country's money supply, China became increasingly vulnerable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was especially true of developments in Latin America, which, once imports from Japan had declined sharpl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oduced virtually all of the silver used in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Qing period.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ccording to Professor Lin, the stage was for a "crisis" in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one that was caused, at least in part, by the protracted struggle f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a struggle that periodically "disrupted [Peruvian, Bolivian, and Mexican] silver mining and the global silver supply" (p. 71).